

文史新证

《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

——《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

张 健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沧浪诗话》无论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在中国美学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其所提出的理论对于后来时代的诗学理论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这部著作还被认为是诗话从以资闲谈的笔记体著作走向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严肃理论著作的标志,被视为宋代诗话的集大成之作,是诗话发展史的一个高峰。《沧浪诗话》是严羽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完整的诗话著作,这乃是学术界的定论,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但笔者经考证认为,《沧浪诗话》并非严羽所编。《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而只是一些单篇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严羽的再传弟子元人黄清老汇集在一起,到明代正德年间才被胡 冠以《沧浪诗话》之名,而其定名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末。由于《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著作,所以学术界关于《沧浪诗话》在诗话发展史上地位的论断乃至整个诗话发展史就有重新认识之必要。由于通行本《沧浪诗话》的文本为元人所辑,故其文本价值就要重新认识,由文本差异所引出的对于该书的理解及评价的歧异也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关键词:成书问题;《沧浪诗话》;严羽;黄清老;胡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1999)04-0070-16

一、严羽编《沧浪诗话》说在宋代有关文献中找不到证据

诗话的成书大体上有两类情况:一类是著者生前自己编定,如欧阳修《诗话》即是;另一类著者原无是书,由后人辑录而成,如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即属此类。学术界一向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亲自编定,但要确证《沧浪诗话》一书为严羽所编定,必须有明确的文献学上的依据。但是,首先在宋代有关文献中找不到这种证据。

1. 严羽本人及同时人未言及《沧浪诗话》一书

要确证《沧浪诗话》一书为严羽所编定,最有力的莫过于在严羽本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据。严羽本人确实提到过其论诗著作,其《答出继叔吴景仙书》中说:“仆之《诗辩》¹,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这里提到了现今流传的《沧浪诗话》中的一篇《诗辩》。这

收稿日期:1999-04-30

作者简介:张健(1964-),男,安徽阜阳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¹ / 辩”字它本或作“辨”,二者通。

被人们作为严羽编定《沧浪诗话》的最直接的证据。但是,严羽这里并没有提到《沧浪诗话》之名,他与吴景仙所讨论的只是《诗辩》一篇。根据这封书信,严羽将其《诗辩》寄给了吴景仙,吴景仙致信严羽,对其《诗辩》提出了质疑,这即是严羽在信中所谓的“吾叔靳靳疑之”。严羽写这封答书,就是要为自己辩解。按通常理,如果严羽有《沧浪诗话》这部完整著作的话,他应将全书寄给吴景仙,但严羽何以不提其书名,说“仆之诗话”,而只提到其中的一篇呢?有解释说,这表明严羽此时正在撰写《沧浪诗话》一书,但还没有完成。但是,这种解释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沧浪诗话》是严羽生前写定。只有预设了这一前提,以上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种前提的预设,我们也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严羽原本并没有《沧浪诗话》一书,《诗辩》根本不是《沧浪诗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篇独立的论著。所以由严羽提到《诗辩》并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

著名诗人戴复古曾与严羽有相当的交往,他也曾提到严羽的诗观。戴氏《祝二严》有云:

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齟齬。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

有人认为“持论伤太高”一句所指的就是《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也推测戴复古可能见到过《沧浪诗话》。[1](《宋诗话考·沧浪诗话》)但这些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能得到确证。此所谓“持论伤太高”,既可以指严羽与戴复古在一起谈诗,放言高论,惊世骇俗,也可以指严羽论诗著作中的一篇《诗辩》而言。戴复古这里没有提到《沧浪诗话》,所以并不能由这句诗确证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

《沧浪诗话》一书的内容几乎全被收入了《诗人玉屑》中,这是人们认定《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编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诗人玉屑》卷首有黄 作于理宗淳 甲辰(1244)的序文,人们由此断定《沧浪诗话》当成书于此年之前。又由于《沧浪诗话》的《考证》篇中有“近宝庆间,南海漕台开杜集”一语,于是认定《沧浪诗话》成书的上限在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8)。这样,《沧浪诗话》的成书时间就被推断在公元1228年至1244年之间。但是,《诗人玉屑》并没有提到过《沧浪诗话》之名,我们并不能由《诗人玉屑》来证明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因为《诗人玉屑》中所编入的内容有可能是严羽的单篇著作,这些著作并不是从属于一部诗话著作。只有先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然后才能确认《诗人玉屑》所录为《沧浪诗话》一书的内容,而不能由《诗人玉屑》收录的内容来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

在《诗人玉屑》之后,范 文《对床夜语》卷二曾引述《诗辩》中“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及“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两段文字。范氏此书有其友冯去非序,谓“景定三年(1262)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据此可知《对床夜语》成书当在此年以前。如果我们把《诗人玉屑》的成书时间假定为黄 作序的1244年,而把《对床夜语》的成书时间假定为冯去非作序的1262年,则《对床夜语》之成书上距《诗人玉屑》有18年。范 文所引的两段文字没有注明篇名及书名,因而从《对床夜语》一书也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宋末元初人蔡正孙《诗林广记》曾引及《诗辩》、《诗体》的文字,但也只是标“《诗体》”、“沧浪《诗体》”、“沧浪《诗辩》”、“严沧浪云”,并未言及《沧浪诗话》之名。

无论是严羽本人还是戴复古,无论是《诗人玉屑》还是《对床夜语》、《诗林广记》,都没有提到过《沧浪诗话》一书。

2. 黄公绍序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也未言及《沧浪诗话》

严羽去世后,现知最早搜集严羽遗作的是宋末李南叔,李氏搜集严羽遗诗编成《沧浪吟

卷》。郭绍虞先生认为,李南叔录本中收录了《沧浪诗话》一书,此即是宋刻本的《沧浪诗话》。[2](《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郭先生这个说法影响甚大,但事实上并不可信。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已经亡佚,但是尚存有黄公绍一序。其序有云:

吾樵名诗家者众矣,近世称二杜三严。余幼时,见东乡诸儒藏严诗多甚,恨不及传。今南叔李君示余所录《沧浪吟卷》,盖仅有存者。俾余序其篇端。余于此重有感矣。……三严之诗,不可尽得,得其一
篇一咏,亦足以快;而况于沧浪之卷犹存十一于千百,不已幸乎。后之览者,其永宝之哉!

这篇序文的文字,元刻本与《适园丛书》本相同,而这两个本子与其它诸本有些差异。这些版本问题容后讨论。在这篇序文中,黄公绍谓其年幼时“见东乡诸儒藏严诗多甚,恨不及传”,此处明确说的是“严诗”;下面又说“今南叔李君示余所录《沧浪吟卷》,盖仅有存者”,这句承上句,谓李南叔所录的《沧浪吟卷》乃是仅存的诗歌作品。在序文的后面,黄公绍又说“三严之诗,不可尽得”,紧接着说“而况于沧浪之卷犹存十一于千百”,说的还是诗作。黄公绍序表明,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所录的只是当时所仅存的严羽的诗歌作品,而没有诗话。我们甚至可以再退一步说,至少从黄公绍的序文不能证明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含有《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之所以会认为李南叔录本收录了《沧浪诗话》,乃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了严羽的论诗著作,并且收录了黄公绍的序文,于是他便认为明刻本《沧浪吟卷》与李南叔录本相同,因而据此推断李南叔录本也收录了《沧浪诗话》。其实,明刻本《沧浪吟卷》源自于元刻本,乃是经陈士元、黄清老重新编校的本子,已经不同于李南叔录本。此一点容后讨论。郭绍虞先生由明刻本确证李南叔录本收录了《沧浪诗话》,并不可相信。

从严羽本人到戴复古,再到《诗人玉屑》,乃至黄公绍,都没有提到《沧浪诗话》一书。严羽编定《沧浪诗话》说在以上的文献中得不到证明。

二、从《沧浪诗话》的版本源流看:元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 《诗辩》等论诗著作均无《沧浪诗话》之名

严羽的著作集有两类:一类是只收录诗歌作品的诗集本,一类是既收录诗作又收录论诗著作的全集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全集本的《沧浪吟卷》中附列了《沧浪诗话》一书。但据笔者考察,在元明刻本《沧浪吟卷》中,所列《诗辩》等五篇著作,都是以单篇形式并列在卷一,并没有将这五篇论诗著作放到“沧浪诗话”或“诗话”的名目之下。也就是说,元明刻本的《沧浪吟卷》中并不存在《沧浪诗话》之名。

1. 元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未标《沧浪诗话》之名

我们上面说过,李南叔所编的《沧浪吟卷》并不包括诗话在内,而只是诗集。包括诗话的本子,最早的是元刊本。

关于元刻本的存在,明正德间都穆《重刊沧浪先生吟卷叙》称“是书在元尝有刻本”,可以证明。值得庆幸的是,元刻本现在尚存。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元刻本《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黑口,半叶十行,小字双行,行二十字,题“樵川陈士元 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此本卷首有黄公绍为李南叔录本所作序。序文与《适园丛书》本同,序末题“岁尚章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并有“公绍”、“在轩”、“五经之家”三印。此刻本钤有各家藏书印,其中一印为“元本”[3](P36),可知前人已经判定此书为元刻本。又,此书钤有“胡 藏书”之印¹,知此书

¹ 胡 (1822—1861),字心耘,浙江仁和人,号琳琅秘室,琳琅主人。官太常博士,喜收宋、元善本。

曾为胡 所藏。而北京图书馆藏有胡 用元刊本校过的明正德胡重器刻本,校记中曾记元刊本的特征,如谓“元本每半叶十行,行廿字”,元本目录“沧浪严先生吟卷”诸字“此行双行写大字”,等等,均与此本相合。可知,胡 所用的元刻本就是他所藏的这个本子。今人屈万里、昌彼得先生据是书版式字体及序末所题“岁尚章摄提格”判定此刻本为前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刻本。[3](《图书版本学要略》)但是,这个判定有错误。此刻本题“进士黄清老校正”,但前至元二十七年黄清老刚刚出生¹,而黄氏成进士乃是在泰定四年(1327)。因而这个刻本不可能早于泰定四年。尽管屈、昌二氏判定这个本子是前至元二十七年刻本有误,但其为元刻本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说过,关于黄公绍的序文,元刻本、《适园丛书》本^④与其它本子有文字上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为:它本序文末题“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元刻本及适园本题“岁尚章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前一个题署,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一是“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根据前一种断句法,黄公绍作序的时间为咸淳四年(1268)。根据后一种断句法,黄公绍为咸淳四年进士,而其作此序文的时间不定。但是,《邵武县志》、《邵武府志》等传记资料及《四库全书总目》均载黄公绍为咸淳元年(1265)进士,没有异论,应属可信,所以此句应以“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这一断句法为是。据此,黄公绍的序文作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但是按照元刻本序末所题,黄公绍的序文应作于元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两种版本的序文所题的作序时间不一致,应该如何解释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咸淳四年进士”的题署乃是后人所改,而元刻本的题署乃是正确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先刻于宋咸淳四年,而于前至元二十七年重刻,黄公绍重书其序,并改题了作序时间。^⑤由于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以上两种说法都还属于推测。但是,不论哪一种说法正确,都可以确认黄公绍序不是为陈士元、黄清老编校本而作。因为黄公绍序最迟作于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而陈、黄编校本的刊刻是在泰定四年(1327)以后,黄序早于陈、黄编校本的刊刻至少37年。并且黄公绍序中根本没有提到陈士元、黄清老二人。可以判定,黄公绍序与黄清老校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元刻本《沧浪吟卷》在卷一列《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诗证》(此为目录所标,而在卷中作《考证》)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但是,元刻本只列了《诗辩》等五篇的篇名,并没有标《沧浪诗话》之名。这一事实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包括《诗辩》等五篇,元刻本应该标出《沧浪诗话》的书名,再标出篇名,以表明此五篇乃是一部诗话著作。但元刻本何以只列五篇的篇名,而不列全书的书名呢?对于这一事实,研究者们尚没有给予关注,更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一事实正表明《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属于同一部诗话著作,所以元刻本没有标《沧浪诗话》之名。换句话说,严羽本来并没有一部《沧浪诗话》。我们将在后面说到,这五篇著作乃是元人黄清老所汇辑。

¹ 据元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序》,黄清老卒于元至正八年(1348)八月,享年五十九岁,上推其生年当为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

^④ 民国张钧衡所辑《适园丛书》收入《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此本乃是据旧抄本翻刻。张钧衡跋谓,此本来自胡重器刻本,实误。按此本序文、行款均同于元刻本,乃是元刻本的传录本。然元刻本缺诗三首,残一首,而《适园》本不缺残。或录自另一足本,或为后人所补。

^⑤ 清王士禛《蚕尾续文》卷十九《跋严沧浪吟卷》:“余访《沧浪先生吟卷》,积有岁年,康熙戊申(七年,1668)始得宋刻于亡友程太史翼苍(程邑)。”由于宋刻本未见于著录,且王士禛未对这一版本进行描述,此本是否确为宋刻难以确证。如果他所得者确为宋刻本的话,应该是咸淳四年序刻的李南叔录本,由此亦可证明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

2. 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也未标诗话之名

在元刻本以后,明代亦有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的刻本流传。就目前所知,明代收录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有以下几种刻本:

(1) 明王蒙溪刻本,正德八年(1513)跋刻本。此本笔者未寓目,可能已经亡佚。但徐 所刻《樵川二家诗》本录有河阴和春正德八年跋云:“沧浪,九严之一也。顾所著仅存若此,则散逸宜多矣。惜哉!《诗辩》等作,其识精,其论奇,其语峻,其旨远,断自一心,议定千古。”又云:“金宪蒙溪王先生尝过余,阅此欣然,遂以属开封郡斋刻之。”这里说“所著仅存若此”,表明此本是包括严羽全部遗存作品的全集本,序中又提到《诗辩》等作,正表明这一刻本包括《诗辩》等论诗著作在内。这里说“《诗辩》等作”,也特别值得注意。所谓“《诗辩》等作”者,显然是指《诗辩》等论诗著作。如果这些论诗著作是从属于一部叫《沧浪诗话》的诗话著作的话,他何以不直接称这部书的书名,而却要用“《诗辩》等作”来称呼呢?和春没有提到诗话之名,表明在这个本子里,《诗辩》诸篇也没有标以诗话之名,这与元刻本是一致的。这一刻本或许就是来自于元刻本。

(2) 明正德间胡重器刻本,三卷。正德胡刻本,我们见到三种:第一种有正德丙子(正德十一年,1516)林俊序,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李坚后叙;第二种有李坚后叙,但无林序;第三种有林序,但无李坚后叙。以上三种中,前两种刻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后一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而第一种本子为胡 据元刻本校过,并有详细的校记。这三个本子都题“樵川陈士元谷编次,进士黄清老校正”。据林俊序称,胡刻本原有黄公绍序,但被胡重器删去了。这个本子实是元刊本的重刻本。以上三种胡刻本也都是列《诗辩》等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而没有标诗话之名¹。林俊序也谓“《诗辩》等作”,而未称诗话。

(3) 明正德十五年(1520)尹嗣忠刻本,二卷。卷首有都穆正德庚辰(十五年)《重刊沧浪先生吟卷叙》,谓:“是书在元尝有刻本,知 山县事尹君子贞以骚坛之士多未之见,重刻以传。”据此知这个刻本也是从元刻本而来,但将诗合作一卷。此本于卷一列《诗辩》等五篇,并附《答出继叔吴景仙书》,也未标诗话之名。

(4) 明嘉靖十年(1531)郑 刻本,二卷。郑 序云:“《沧浪严先生吟卷》,闽有刻本,姑苏有刻本,亦既传之矣。余……乃复为重刻,以益广其传。”此所谓闽刻本即是胡重器刻本,姑苏有刻本乃是尹嗣忠刻本。而此本乃是据尹本重刻。此本也没有诗话之名。

(5) 明抄本,二卷。有黄丕烈跋。据黄氏跋语,此抄本系尹嗣忠刻本的抄录本。这个本子同尹嗣忠本一样也列《诗辩》等论诗著作,而没有标诗话之名。

(6) 万历邓原岳刻本。此本笔者未尝寓目,或已佚。徐 《樵川二家诗》本录邓氏序,引及严羽诗论,并曰:“吾故并其集为序次而行于世。”知此刻本当收录严羽论诗著作。但笔者所见日本写本《沧浪集》四卷,题邓原岳校,既无邓氏序,亦无诗话。或是写本只录诗作,并删去了邓序。此本在篇次编排上不同于元刻本,第一卷为骚、操、吟、引、谣、歌、行,第二卷为乐府、四言古诗、五言古诗,第三卷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第四卷为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乃是邓氏对篇次作了重新编排的缘故(即邓氏所说的“序次”)。《诗辩》诸篇在此刻本中是否标明诗话,已不能知。然据徐 《严沧浪集序》称,“斯集岁久湮 ,胜国至元庚寅(前至元二十七年,

¹ 胡刻本还有第四种刻本,即嘉靖四年序刻本。此刻本有林俊序,李坚跋,以及嘉靖四年吴铨跋。见河田黑编《静嘉堂秘籍志》卷三十七集部著录。此本笔者未得寓目。

1290), 邑人黄公绍始序而传之。厥后淮阳宪伯胡公岳、吴郡吏部都公穆, 先后授梓。万历间予友邓学宪汝高(即邓原岳)又梓之。”将此本放入元刻本以来的源流中, 可见仍属于元刻本的系统。所以即便此本标明诗话, 也是其所自标, 而非得自另外的版本系统。

(7) 天启吴兆圣、李玄玄刻《樵川二家诗》本, 题《沧浪集》, 此本笔者未寓目。但何望海天启乙丑(五年, 1625)序谓:“《沧浪集》, 余为诸生时, 已订讹披误, 留心有年。兹绥安吴兆圣同予友李玄玄, 乃请而重新之。”可见此本为何望海校订。据徐 序, 此刻本不出上面所列的元刊本及胡重器、尹嗣忠刻本的系统。何望海序云: 严羽“所著为《诗辩》、《诗法》, 一扫狂魔, 归诸正觉。至今吟咏之家奉为三尺”。这里列举了《诗辩》、《诗法》两篇, 没有提到诗话, 可见这个刻本也没有标诗话之名。

以上所叙七种明刻本大体上都是源自于元刻本, 这些刻本都收录了严羽的论诗著作, 但这些本子(除邓原岳刻本尚待判定外)都是只列《诗辩》等篇之篇名, 并没有标明《沧浪诗话》。

3. 清刻本收录《诗辩》等作标诗话之名者, 乃是编者所加

除了以上的元明刻本外, 收录严羽论诗著作的全集本, 还有数种清刻本。

(1) 顺治十年(1653)周亮工诗话楼刻本。(2) 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霞刻《樵川二家诗》本。(3) 咸丰四年(1854)周揆源《樵川四家诗》本。(4) 光绪七年(1881)徐 《樵川二家诗》本。

以上这些清代刻本收录严羽论诗著作, 都标明《沧浪诗话》, 但这些刻本并不在元明刻本的源流之外, 所以尽管这些刻本标明了诗话, 并不能证明《诗辩》等五篇著作原为一部诗话。

通过以上对收入严羽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所作的考察, 可以看出, 元明刻本的《沧浪吟卷》都是只列《诗辩》等篇的篇名, 而没有标明《沧浪诗话》。清刻本虽然标明《沧浪诗话》, 并非有另外的版本来源, 而是受了明末《沧浪诗话》单行本的影响。因此, 从《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 并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为严羽所编定之说。相反, 倒表明此说的可疑。

三、元人黄清老是严羽论诗著作的汇辑者

何以元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不标诗话之名呢? 其实, 原本没有《沧浪诗话》一书, 是元人黄清老搜集汇编了严羽的论诗著作, 《沧浪吟卷》中所列《诗辩》等论诗著作正是黄清老所汇辑的。

1. 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

黄清老(1290—1348), 字子肃, 号樵水, 邵武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 授翰林典籍, 升检阅, 迁应奉, 在朝与虞集、欧阳玄等共事。至正元年(1341)出为湖广儒家提举, 八年(1348)卒, 年五十九。

黄清老之所以与严羽的著作发生了关系, 并不是偶然的。原来他是严羽的再传弟子。黄清老曾师事同郡的严斗岩, 而严斗岩则是严羽的弟子。元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序》称:

内附之初, 前修硕儒, 犹有存者。而文献之传, 性理之学, 往往专门名家。公(按指黄清老)日从诸老讲求其说, 闻见弥广, 声闻弥著。同舍生或趋世所尚, 为吏以事进取。独公笃志励学, 不变如初。久之, 部使者荐为建阳学官。年始逾冠, 士已推服。邑之儒先严斗岩者, 至元季年有诏征之不起。公师事之。斗岩曰:“吾昔受学于严沧浪, 今得子相从, 吾无恨矣。”公自是于《六经》、《四书》之旨, 悦若有得。进三山书院山长, 弗就。挟书入深山之中, 益究其所未至。于是国家设贡举十余年矣。泰定丙寅(按泰定三年, 1326)之秋, 郡守举公应诏, ……公以《春秋》擢第一。明年(按泰定四年, 1327)会试中选, 廷对赐同

进士出身。[4](卷十三)

据苏天爵此文,严斗岩曾受学于严羽,入元后,在前至元的末年曾被征召,但斗岩不赴。黄清老师事严斗岩的时间,根据苏天爵的叙述,应在二十岁以后(逾冠,1310年以后),挟书入深山之前。而黄清老出山应举的时间是在泰定三年(1326)。如果我们假定他入山读书的时间为六年的话,那么他师事严斗岩当在公元1310年至公元1320年之间,也就是二十一岁至三十岁之间。黄清老对严羽十分景仰。他“尝访严沧浪故居,将筑室共斗岩祠之,弗果”。[4](《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序》)他死后被葬在了严羽故居的近旁。

2. 黄清老“裒严氏诗法”

黄清老汇辑严羽论诗著作,见于其密友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该序云:

昭武严氏(按指严羽)痛矫于议论援据、烂熳支离之余,亦以禅而喻诗,不堕言诠,不涉理路,一主于悟矣。然而生宋氏之季,其才其气其学,类未能充其言也。君子惜之。逮于我朝盛际,若樵水黄先生,噫,其志于悟之妙者乎。盖先生之于诗,天禀卓而涵之于静,师授高而益之以超。由李氏(按指李白)入,变为一家。其论具《答王著作书》及裒严氏诗法(按着重号为引者加)。其自得之髓,则必欲蛻出垢氛,融去渣滓,玲珑莹彻,缥缈飞动,如水之月,镜之花,如羚羊之挂角,不可以成象见,不可以定迹求。非是莫取也。噫,何其悟之至于是哉! [5](卷三)

这篇序文的作者张以宁(1301-1370),字志道,福建古田人,亦为泰定四年进士,与黄清老为同年。在元曾任国子助教、翰林侍讲学士。《黄子肃诗集序》称:“以宁与先生皆荐于杭,试于京师。自杭归闽,复自淮如京师。归于闽,同舟而共载。又明年,复见于京师,好逾昆弟。”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所以张以宁的序文是可以相信的。

这篇序文提到的《答王著作书》,就是现在流传的《黄子肃诗法》。《黄子肃诗法》在明史潜刊《新编名贤诗法》中题为《黄子肃答王著作进之论诗法》,在朝鲜伊春年刊刻的诗法汇编《木天禁语》中题作《论诗法答王著作进之》。可见该《黄子肃诗法》原本是一封论诗的书信。王著作,即王克修,字进之,高唐人。至顺元年(1330)为秘书监校书郎,后至元元年(1335)升著作佐郎。以上皆与张以宁序中所言相合。所以从这篇序文可以确认现在流传的《黄子肃诗法》一书的真实性。黄清老这封论诗的书信的核心就是妙悟,显然是继承了严羽的诗学。但是,黄清老论妙悟亦与严羽有所不同,他把妙悟说落实到意、句、字三个方面。他说:“意也,句也,字也,三者全备为妙悟。”这样严羽的有些玄妙的妙悟说就变得平实而可以把握和言传了。

这篇序文中又提到了“裒严氏诗法”一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这里的“严氏”即指严羽,因为上文明谓昭武严氏云云,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裒”是裒辑、汇集之意。所谓“裒严氏诗法”是说黄清老曾汇辑严羽诗法。这句话大值得玩味。这里所说的“诗法”并非是指现在流传的《沧浪诗话》中的《诗法》一篇,而是指现在的《沧浪诗话》一书。因为《诗法》这一篇是完整现成的,没有所谓汇辑的问题。又此所谓“严氏诗法”也不可能是《沧浪诗话》以外的其它的诗学著作,因为张氏序中称严羽“以禅而喻诗,不堕言诠,不涉理路,一主于悟”,所言正是《诗辩》的内容,所以“严氏诗法”指的就是《沧浪诗话》的内容,而不是其它。“严氏诗法”乃是一个统称,统指严羽的这些论诗著作。

张以宁所谓黄清老“裒严羽诗法”的说法正可以与元刻本《沧浪严先生吟卷》相印证。我们说过,李南叔录本是不含论诗著作的,而元刻本却收录了论诗著作,正是黄清老所汇辑的。但这个刻本题陈士元编次、黄清老校正,陈士元与此又有什么关系呢?按陈士元,邵武人,隐居不仕,学者号谷先生。著有《武阳志略》一卷,辑有《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一卷,皆已佚。其友人

黄镇成(1287-1361,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人,隐居著述)在《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序》云:

吾乡自沧浪严氏奋臂特起,折衷古今,凡所论辨,有前辈所未及者。一时同志之士,更唱迭和,以唐为宗,而诗道复昌矣。是时家各有集,惜行世未久,海田换代,六取将,谷陈君士元网罗放失,得数十家,大惧湮没,俾镇成芟取十一,刊刻传远,以见一代诗宗之盛,以见吾邦文物之懿,陈君是心可不谓贤者? [6] (卷三十九)

据此序,严羽论诗在其乡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志之士互相唱和,在当时“家各有集”,但行世不久,宋亡元兴,散佚严重。陈士元“网罗放失,得数十家”。这数十家的集子他无力刊行,就请黄镇成“芟取十一”,编成《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一卷刊行。此事在黄镇成《陈克明一集序》中也曾言及,谓“近陈君谷,搜掇寸片,得诸家,将梓传之而未果”。[7] (卷九)这正可以说明陈士元何以要请黄镇成刊行他所网罗的集子,因为他本人无此财力。由于黄镇成财力也不够,所以黄氏只能芟取十一刊行。这数十家集中是否包括严羽的作品已不可考定,但既然陈士元连严羽的追随者的作品都“搜掇寸片”,尽力网罗,那么严羽的诗作更应该是他网罗的对象。元刻本《沧浪吟卷》题陈士元编次,正表明他搜讨了严羽的作品。元刻本有《沧浪逸诗》数首,应就是陈士元在李南叔录本的基础上辑佚之所得。元刻本题陈士元编次、黄清老校正,很可能是陈士元搜集了严羽的诗作,并对李南叔录本进行了重新编次,由于陈士元无力梓行,便交给了黄清老,而黄清老中进士后,进入朝廷为翰林典集等官,他有能力梓行严羽的集子。他便将陈士元所搜讨的诗作与自己搜集的论诗著作合起来刊行。

3. 由黄清老“哀严氏诗法”可证《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

在确认了黄清老汇辑“严氏诗法”之后,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严羽生前就编定《沧浪诗话》一书,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流传,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得之于其师严斗岩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何以会有“哀严氏诗法”之说呢?此其一。如果在黄清老之前确有《沧浪诗话》一书,作为元刻本《沧浪吟卷》第一卷的《诗辩》等论诗著作,只不过是將《沧浪诗话》一书的内容移过来,放到《沧浪吟卷》里面而已,又何以有汇辑之说呢?此其二。其三,如果说严羽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而此书在黄清老的时代已经亡佚,是黄清老搜讨遗逸的话,那么,其师严斗岩自然知道此书之书名,黄清老自应题其书的原名,那么何以在元刻本中不标原书的书名,而只列《诗辩》等五篇之篇名呢?其四,如果确有《沧浪诗话》一书的话,张以宁又何以不称其“哀严氏诗话”,却称其“哀严氏诗法”呢?

以上四点足以表明,直至黄清老的时代,并不存在《沧浪诗话》一书。由于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他对严羽著作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由于张以宁是黄清老的密友,他所说的黄清老的情况是可信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可以推断,严羽原没有《沧浪诗话》一书,《诗辩》等五篇原来只是单篇的著作。这也正可以解释,何以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只言《诗辩》,而不言诗话,因为他原本并没有这部诗话。

《沧浪诗话》中,除《诗辩》一篇严羽本人曾经提及外,《诗体》一篇,《诗人玉屑》也注明为严羽所编。因而以上两篇可以肯定为经严羽所亲定。除以上两篇以外,像《诗法》、《诗评》等篇并不一定是严羽自己编定。《诗法》诸条的编次没有内在的条理,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诗评》对从《楚辞》到唐人都有评论,但各条的编次也没有内在的条理。这与《诗体》的编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诗法》、《诗评》可能是严羽所写的札记,或是他与门弟子论诗的记录,而由其门弟子汇辑起来的。黄清老搜集严羽论诗著作,并不是简单地将《诗人玉屑》的诸篇汇集起来而已。现在流行的黄清老校本《沧浪诗话》与《诗人玉屑》所录在文字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尤

其是《诗辩》一篇,差异相当之大。这表明,黄清老校本当有另外的版本来源。由于这些论诗著作原本不是一部诗话著作的内容,所以黄清老在汇辑这些著作时,也没有给它们标上诗话的名字。正是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刻本《沧浪吟卷》在收录这些论诗著作时何以只列各篇的篇名,而没有标诗话之名,因为原本并不存在《沧浪诗话》一书。

4. 黄清老汇辑本不只一个版本

现在流传的《沧浪诗话》都是源自我们上面说的元刻本,也就是黄清老汇辑的本子。但是黄清老汇辑本在元代也并不只有一个本子,而是有两个以上的本子。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高 的《唐诗品汇》,大量征引了严羽的诗论。由于编成这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需要甚长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他所征引的严羽著作乃是元代的本子。

从高 所引严羽《诗辩》的内容看,其所引的文本乃是黄清老汇辑本,而非《诗人玉屑》本。黄本有区别于《玉屑》本的明显标志,如“禅家者流”一段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之前,如谓“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如谓“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些都是黄本区别于《玉屑》本的标志。《唐诗品汇》所引以上诸节文字同于黄本,因而可以判定,《唐诗品汇》所引的文本属于黄本的系统。

但是,《唐诗品汇》所引的文字与现存元刻本也存在着差异。如元刻本《诗评》中评李杜云: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以上三条在《唐诗品汇》中被合为一条:

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子美沉郁,太白飘逸。太白《梦游天姥吟》、《蜀道难》等篇,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作,太白不能作。后之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唐诗品汇》卷四引)

高 引严羽论诗语,每条皆独立,并在句前冠“又曰”,如在此条前有“又曰:太白发语,谓之开门见山”。在此条后有“又曰: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如李广”,皆各自独立。所以上一条不是高括而然,而是其所据的文本如此。

又,元刻本《诗评》中云:“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但《唐诗品汇》卷二十引此条评孟郊,引文作:“孟郊之诗刻苦,其句法格力,可以见矣,读之令人不欢。”又,元刻本《诗评》中“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条,所引苏、李诗及刘干、杜甫诗皆是两句,而《唐诗品汇》卷十二高适《别王彻》诗后引此条,以上诸人诗各是一句。

从以上诸处的差异,我们可以判定,《唐诗品汇》所引的严羽论诗著作虽然属于黄清老汇编本的系统,但并非来自现存的元刻本,而是另外的本子。这表明黄编本在元代并不只有一个本子。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有其它材料证明。现存元刻本在所附《答出继叔吴景仙书》题后有小注云:“按他本,沧浪《答吴保义手书》。吴陵,字景仙,表叔行,有诗名。”这行小注也表明有其它刻本的存在。

四、从单行本之版本源流看《沧浪诗话》成书及得名之由来:

明正德胡 刻本始有《沧浪诗话》之名

《沧浪诗话》除见于《沧浪吟卷》一书外,还以单行本流传。学术界一般认为,严羽的《沧浪

诗话》原来是单行的,只是到后来才被收入《沧浪吟卷》中。这种观点实际上渊源于《四库全书总目》。该书卷一六三《沧浪集》提要说:

其《诗话》一卷,旧本别行,此本为明正德中淮阳胡仲器所编,置之诗集之前,作第一卷,意在标明宗旨,殊乖体例。今惟以诗二卷著录别集类,其《诗话》别入诗文评类,以还其旧焉。

又卷一九五《沧浪诗话》提要云:

此书或称《沧浪吟卷》,盖闽中刊本,以《诗话》置诗集前,为第一卷,故袭其诗集之名,而实非本名也。

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沧浪诗话》原本是以单行本行世的,只是到明正德间胡重器刻本才将《沧浪诗话》置于诗集之前。当代学者多从其说。但这个说法乃是错误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明正德胡重器刻本之前,还有一个元刻本,也是将严羽的论诗著作列在诗作之前。而胡重器的刻本恰恰是从元刻本来的。所以单就这一点而言,这个说法就不可为据。

1. 元代曾有论诗著作单行本

前面说过,黄清老之前不可能有《沧浪诗话》一书。郭绍虞先生所谓有宋刻本《沧浪诗话》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2](《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正是黄清老汇辑了严羽的论诗著作,即是张以宁所说的“袁严氏诗法”。黄清老所汇辑的严羽论诗著作在元代也有单行本。明代怀悦刻本的诗法汇编《诗家一指》及杨成刊本《诗法》中在《严沧浪诗体》前都有一段题记:

《严沧浪先生诗法》,亦有印本。所论多出《诗家一指》中。盖此公于晚宋诸公石屏辈同时,此公独得《一指》之说,所以制作非诸人所及也。自家立论处,依旧有好处。今摘写于此中,其余出《一指》者,兹不再编矣。然诸家论诗多论病而不处方,卒无下手处。

笔者曾考证怀悦編集本诗法汇编《诗家一指》及杨成本诗法汇编《诗法》的初编当在元末,此处的编者题记也当在元末。但是这则题记有个错误,那就是题记者因《诗家一指》“三造”部分中引有严羽论诗语,而误认为《诗家一指》的年代早于严羽,严羽受《诗家一指》的影响。[8](P31)不过这则题记表明,元末曾有《严沧浪先生诗法》的刻本,这个刻本与张以宁所说的黄清老“袁严氏诗法”的说法相合。因而这个《严沧浪先生诗法》应就是黄清老所汇辑的严羽论诗著作的单刻本。以上两部诗法汇编本所收入的《严沧浪诗体》,编入了《诗体》、《诗评》部分的内容,已经被严重地窜改。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把严羽原著中的“本朝诸公”改成“宋”,又把所引《诗评》部分的内容冠以“总论”之名。

2. 明正德以前没有《沧浪诗话》之名

《唐诗品汇》在《历代名公叙论》中所引《沧浪诗话》的内容之后,分别标明“已上见《诗辩》”、“已上见《诗评》”、“见《诗法》”,没有提《沧浪诗话》之名。在《引用诸书》中标有“严沧浪云”,并注“《诗辩》、《诗评》、《考证》。”也没有提《沧浪诗话》之名。这表明在明代初年,尚没有《沧浪诗话》之名。

就我们目前所知,明代最早的单行本是明正德二年(1507)刊的《沧浪严先生诗谈》。黄丕烈跋明抄本《沧浪严先生吟卷》云:

余向得《严沧浪先生吟卷》有二,皆樵川陈士元编次、进士黄清老校正者。……此外,又有《沧浪严先生诗谈》,系正德二年本,但有《诗辩》等,无《答吴景仙书》及五言绝句以下诗。盖专论诗法,不称《吟卷》矣。

黄丕烈所得的两种《严沧浪先生吟卷》都是胡重器刻本。他所说的《沧浪严先生诗谈》这个本子,笔者未曾寓目。而阮元文选楼刻《天一阁书目》曾著录《沧浪严先生诗谈》一册,应就是这个

本子。黄丕烈在跋语中将它与胡重器刻本相比较,认为《沧浪严先生诗谈》只是缺少《答吴景仙书》及诗歌作品,可见《诗谈》这个本子与胡刻本的《诗辩》等五篇是相同的。据此,则《诗谈》乃是从《沧浪吟卷》中将《诗辩》等五篇独立出来而自成一书的。并且,这个本子也并不称“《沧浪诗话》”,而是称“《沧浪严先生诗谈》”,可见正德刻本的刻者也并没有见过有《沧浪诗话》,因为如果这个本子所据的是一个叫《沧浪诗话》的单行本的话,他不应把书名中的关键字“诗话”改成“诗谈”。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十八著录《严沧浪诗谈》一卷,解题云:

宋菴溪严羽仪卿著。列诗辩、诗体、诗注(按当作“法”)、诗评、诗考证,定诗宗旨正变得失,议论痛快,识高格当。

这个本子也只有《诗辩》等五篇,而没有《答吴景仙书》,与黄丕烈所叙的正德二年本相同。虽然在关键字“诗谈”的前面一是“沧浪严先生”,一是“严沧浪”,但这很可能是著录者的略称。比如《沧浪严先生吟卷》或被称为《严沧浪吟卷》,或被称为《沧浪吟卷》。所以这里著录的《严沧浪诗谈》应就是正德二年刻本。又,《万卷堂书目》卷四杂文类著录《诗谈》一卷,题严羽著。这里略去了严沧浪或沧浪严先生几个字,所指的也应就是正德二年刊本。

3. 正德十一年刻本始有诗话之名,命名者为胡

最早将《诗辩》等五篇论诗著作命名为诗话的是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序刊本《严沧浪诗话》(阮元《天一阁书目》中著录为《沧浪诗话》)。此本卷首有胡 序云:

国朝少师西涯李公,尝称严沧浪所论诗法,谓其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说,未尝有失。余因取其集读之,信然。虽然,在宋儒已称其诗宗盛唐,自风骚而下,讲究精到,而近时河阴和君亦谓其《诗辩》等作,其识精,其论奇,其语峻,其旨远,断自一心,议定千古,至于指妙悟为入门,取上乘为准则,陋诸子为声闻,评辩考证,种种诣极,则又知沧浪之深者乎。余窃爱其“诗有别材”一段,尤为知作诗之妙,得性情之本,其他则前辈或多异同,未之敢复辩也。余愚且陋,学诗数年,病未知其要,晚于沧浪之论,欲取则焉。因意海内学诗之士或有同情者,独取其《诗辩》、《体》、《法》、《评》、《证》诸篇,正其讹而传之,总其名曰诗话。若夫全集,则已梓之开封郡斋云。时皇明正德丙子岁孟春望赐同进士出身知慈溪县事延平胡 序。

胡 ,字国华,福建延平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由慈溪知县入为御史,历按贵州、浙江。其序刻严羽论诗著作,即是在慈溪知县任上。胡 在序中所提到的开封郡斋刻本就是正德八年王蒙溪刻本。这个刻本有和春序,胡 序中所说的“近时河阴和君亦谓其《诗辩》等作”云云正是和春序中语。胡 在序中说,“独取其《诗辩》、《体》、《法》、《评》、《证》诸篇,正其讹而传之”,这清楚地表明,他所序刻的《严沧浪诗话》是从全集本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沧浪吟卷》中分离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一个单行本。在这篇序文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总其名曰诗话”一句,这句话表明,是胡 把《诗辩》等五篇给予了一个总名叫《严沧浪诗话》。这正表明,在胡 刊本之前,没有一本题名《沧浪诗话》的本子的。因为如果胡 之前,本来就有《沧浪诗话》,他不可能会说自己名之曰诗话的。胡 的这段话正可以与张以宁序黄清老诗集中称严羽论诗著作为“诗法”、杨成刊本《诗法》的编者称《严沧浪先生诗法》相印证。

自正德胡 刻本之后,题名为《沧浪诗话》的单行本就多了起来。最著名的有毛晋《津逮秘书》本《沧浪诗话》,以及《说郛》本《沧浪诗话》。从此以后,《沧浪诗话》遂成定名。

五、关于《沧浪诗话》的一些问题的重新认识

1. 对《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两个文本价值的评估

关于《沧浪诗话》的文本,在《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在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中已经被清楚地揭示了出来。根据郭绍虞先生的说法,《沧浪诗话》原本有个宋刻本,即是所谓的咸淳四年序刻本,这个刻本已不得见。现在的通行本都是源自于明刻本,但明刻本“经过窜改,错误较多”[2](《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而《诗人玉屑》本作为《沧浪诗话》的宋刻本,保存了《沧浪诗话》的原貌。所以郭先生校释《沧浪诗话》,特重《诗人玉屑》本,称其在“先后排次及各条分合之间,亦以《玉屑》为主,正今传各本之误”。[1](《宋诗话考·沧浪诗话》)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定,并不存在郭先生所谓的《沧浪诗话》的宋刻本,而元刻本的《沧浪诗话》他也没有见过,他不知道明刻本乃是从元刻本而来,其所谓明刻本的“窜改”“错误”之说就只是臆测,不可据信。¹这样,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诗人玉屑》所收录的文本与通行本的文本究竟哪一个更可靠呢?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和评价严羽的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的差异主要是在《诗辩》,两者不仅文字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结构顺序上也有着重大的不同。这两个本子何以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所撰定,既然为严羽生前所定,那么,《沧浪诗话》的文本就应该是唯一的,就是严羽《沧浪诗话》定稿时的文本。但是,严羽本人生前并没有作《沧浪诗话》一书,并不存在《沧浪诗话》的定稿。这样,文本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据笔者考察,《诗辩》篇还不止以上两个文本,还有第三个文本,那就是《夜语》所引用的文本。我们在前面说过,范文《夜语》曾引用过《诗辩》的文字。《对床夜语》成书虽晚于《诗人玉屑》近二十年,但却大大早于通行本,其所引的文字对我们考察《诗辩》的文本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将《对床夜语》所引的文字抄录如下,并与《诗人玉屑》及通行本对勘。

严沧浪羽云: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玉屑》及通行本此处有“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三句,盖为《夜语》略去)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通行本无“之悟”二字),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陶、谢至盛唐诸公(“陶、谢”,《玉屑》及通行本皆作“谢灵运”),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才”,《玉屑》及通行本作“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而古人”二句,通行本作“然非多读数,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诠,《玉屑》作“鉴”),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诗人,通行本作“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寻,《玉屑》、通行本作“求”)。故其妙处,莹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影,《玉屑》及通行本作“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通行本于“诸公”后有“乃”字),以文字为诗(通行本“以”前有“遂”字),以议论为诗(通行本此句在“以才学为诗”后),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通行本无此句),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玉屑》及通行本于此句后尚有“且其作多务使事”一段,盖范氏此处为节引之故)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

通过将《对床夜语》所引的两段文字与《诗人玉屑》、通行本对勘,我们发现,这两段文字更接近于《诗人玉屑》,而与通行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那么,《对床夜语》所依据的文本是不是直接抄录《诗人玉屑》而来呢?也不是。因为《对床夜语》的文字与《诗人玉屑》本也存在着差异,比如《夜语》“诗有别才”,《玉屑》及通行本作“材”;《夜语》中“陶、谢至盛唐诸公”一句,《玉屑》本和通行本就作“谢灵运至盛唐诸公”;《玉屑》本“镜中之像”,在《夜语》中作“镜中之影”;《玉屑》本“无迹可求”,在《夜语》中作“无迹可寻”。其中,“陶、谢至盛唐诸公”一句,与《诗人玉屑》及通行本

¹ 黄景进先生已经据元刻本指出郭说的这个问题。见《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第38-39页。

差异甚大,关系到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不是一般的文字歧异。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对床夜语》所引的文本不是直接抄录《诗人玉屑》而来,而是来自其所见到的《诗辩》的另一文本。

由于《对床夜语》只引以上两段文字,所以我们无法对《对床夜语》所引文本的总体情况作出判断,但是就以上两段在文字上更接近《诗人玉屑》本来看,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对床夜语》所引的《诗辩》的文本应非常接近《诗人玉屑》本。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流传在宋末的严羽论诗著作的文本可能就是《诗人玉屑》及《对床夜语》所依据的文本系统。

对于通行本所源自的黄清老校正本的文本来源,现在已不能确切地考知。这一文本是否得自其师严斗岩呢?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十分大。严斗岩本人并没有完整保存严羽的著作,甚至并没有保存严羽的著作。如果严斗岩保存了严羽的著作的话,何以李南叔录本仅存什一于千百呢?何以黄清老校本并没有更多地增补呢?如果严斗岩藏有严羽全部的论诗著作的话,黄清老何以还要“哀严氏诗法呢”,从其师那里直接刊印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们认为严斗岩顶多藏有严羽部分的论诗著作,或者根本没有保存。黄清老所得的文本有可能得自于当时流传的抄本。

由于黄清老搜集刊刻严羽著作的时代距离《诗人玉屑》的刊行已经有八、九十年时间,严羽的著作在传抄的过程中有被改动的可能,所以通行本的文本很有可能是被改动过的本子。而《诗人玉屑》本由于早于通行本,而且有《对床夜语》的印证,其可信度要大大高于通行本。

2. 关于《诗辩》中结构顺序问题

在《诗人玉屑》所编入的《诗辩》中,是以“学诗者以识为主”一段开始的,而通行本以“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开端。这两种文本在结构顺序上的差异表面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结构顺序不同,强调的重点就有所不同。如果以“学诗者以识为主”开端的话,那么全篇的中心在“识”字,郭绍虞先生作《沧浪诗话校释》,《诗辩》篇的结构顺序依据的是《诗人玉屑》,所以郭先生认为,《沧浪诗话》一书论诗,“关键在一‘识’字。《诗辩》开端第一句,‘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开宗明义,已极明显”[1](《宋诗话考·沧浪诗话》)。如果是以“禅家者流”一段开始的话,则全篇的重心就是诗禅说。如果我们认定《诗人玉屑》的文本更加可靠的话,则关于《诗辩》的结构顺序就应以《玉屑》本为准。

3. 关于严羽不知禅的问题

严羽以禅喻诗,但钱谦益、冯班等人则指责其不知禅。其最引起非议的是下面一段话: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钱谦益、冯班认为,声闻、辟支果就是小乘禅,而严羽把大历以还之诗比作小乘禅,而又把晚唐诗比作声闻辟支果,等于说声闻、辟支果不如小乘禅,这样就把声闻、辟支果独立于小乘禅之外。钱、冯二人据此认为严羽不懂禅。

但以上这段话与《玉屑》本在文字上有差异。在《诗人玉屑》中,“大历以还之诗”后无“小乘禅也”四字,根据这种文本,并不存在将声闻、辟支果置于小乘禅之外的问题。郭绍虞先生校《沧浪诗话》就指出了这一点,称“据《玉屑》则沧浪原不误”。元人诗法《诗家一指》曾引述《诗辩》谓“大历以还已落第二义,晚唐则声闻、辟支”,同于《诗人玉屑》。据我们对两个文本的考察,《诗人玉屑》更为可信,通行本的文本可能为传抄者所加。

4. 关于“有分限之悟”的问题

《诗人玉屑》本有“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一段,其中“有分限之悟”一句,在通行本中作“有分限”,没有“之悟”二字。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从通行本,以为“之悟”二字为衍字,当代研究者皆从其说。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床夜语》所引的文字与《诗人玉屑》相同,这表明“之悟”二字并不是《诗人玉屑》本所衍,而是原本如此。根据通行本,悟的深浅有两种:一种是透彻之悟,一种是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前者是严羽肯定的,后者是其所否定的。但是,依《诗人玉屑》及《对床夜语》的文本,悟的深浅就有三种:一是“分限之悟”,乃是有限度的悟,悟到一定的程度,但还不透彻;二是“透彻之悟”,乃是最高的境界;三是“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这种悟低于“分限之悟”。三者之中,“透彻之悟”最高,“分限之悟”虽低于“透彻之悟”,但高于“一知半解之悟”,严羽对其肯定的程度高于“一知半解之悟”。元人《诗家一指》引述《沧浪诗话》云:“禅在妙悟,诗道亦然。悟有三:有透彻,有分解,有一知半解。”这里所引在文字上并不准确,其所谓“分解”就是上文所谓“分限”,但是其所谓“悟有三”,正与《诗人玉屑》本相合。

以上文字《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哪一个更合理呢?一般都认为通行本为正确。但笔者却认为《诗人玉屑》本更合理。这不仅是因为《诗人玉屑》的文本有《对床夜语》及《诗家一指》的旁证,而且从文意上来说,也以《诗人玉屑》本更合理。严羽论唐诗,盛唐高于大历,大历高于晚唐,则唐诗至少有三个等级。如果悟的等级只有两个即透彻之悟与一知半解之悟的话,要么是“透彻之悟”,要么是“一知半解之悟”,只有两个层级,这样就不能用来说明唐诗的三个层级。而照《诗人玉屑》本,则可以说盛唐是透彻之悟,大历是分限之悟,而晚唐是一知半解之悟。所以《玉屑》本当更合理可信。

5. 关于“透彻之悟”的问题

《诗人玉屑》本及通行本有“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一句,但在《对床夜语》中却作“陶、谢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照前者,透彻之悟不包括陶渊明,而依后者,则包括陶渊明。这个差异关涉到对陶诗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诗评》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根据这种说法,晋以后诗与汉魏诗有着明确的分界。正是因为汉魏古诗气象混沌,所以《诗辩》说:“汉魏尚矣,不假悟也。”在他看来,陶渊明诗已不属于气象混沌一类,所以不属于“不假悟也”的一类。如果他说谢灵运至盛唐诸公诗是透彻之悟,那么陶渊明既不属于“不假悟也”的一类,也不属于“透彻之悟”的一类。而在他看来陶诗又高于谢诗,所以更不属于第二义之悟。那么,陶诗在他的诗禅说中就无处安身。如果按照《对床夜语》的文本,则陶渊明与谢灵运都属于透彻之悟的一类。所以在笔者看来,此处《对床夜语》的文本更合理。

6. 关于《考证》是否为严羽作的问题

《沧浪诗话》中有《考证》篇,此篇在元刻本的目录中作“诗证”,而在卷内则作“考证”。此篇在《诗人玉屑》中并没有标明为严羽作。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编定,《考证》篇既然收入通行本的《沧浪诗话》中,则其为严羽作是无疑的。但是,现在我们考定《沧浪诗话》辑于元代,那么就有一个问题:黄清老所编入的《考证》篇是否为严羽所作呢?由于辑者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黄清老把《考证》作为严羽的著作是有根据的。但是,也不能绝对排除《考证》篇是来自于《诗人玉屑》的可能性。如果其文本确实是来自

《诗人玉屑》而又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考证》是否为严羽作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7. 关于《沧浪诗话》的地位及影响问题

《沧浪诗话》在诗歌批评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地位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论价值及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在诗话发展史上的地位。学术界认为,诗话体发展到《沧浪诗话》,从以资闲谈的笔记体发展成为严肃而有体系的理论专著。学者们论证《诗辩》等五篇如何互相关联,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但是,原本并不存在一部《沧浪诗话》,《诗辩》等作五篇原来只是单篇的著作。这五篇著作中唯一可以认定为严羽亲定的只有《诗辩》一篇,而从体裁上说《诗辩》乃是论辩体,而不是诗话体。像《诗法》、《诗评》原本是否独立成篇也还不能确定,也许是严羽与其门弟子谈诗的记录,为其门弟子分类汇集成篇。由于严羽本人并没有作诗话的意识,由于原本并不存在《沧浪诗话》这部诗话著作,因而我们就不能把后人汇辑而成的《沧浪诗话》放到诗话体的发展史中来评价。这就像《带经堂诗话》为王士禛弟子所编,我们不能说这部诗话如何有体系性,在诗话发展史上应占什么地位,因为王士禛并没有作这部诗话。如果后人汇辑前人论诗著作而成的诗话也可以放到诗话发展史中来评价,那么我们今天辑苏轼论诗语编成《东坡诗话》也就可以放到诗话史中去评价。这样的话,诗话史就成为一笔糊涂账。事实上,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元人并没有把《诗辩》等五篇视为诗话,而是将这五篇论诗著作当作诗法来看待的。黄清老的密友张以宁称这些著作为“诗法”,就是如此。张以宁是个进士,又是个有相当名气的诗人,他的看法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元代汇编诗法的人也称“严沧浪先生诗法”,而不称诗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明代,人们才将这些著作视为诗话著作。根据以上所说,笔者认为,学术界所谓《沧浪诗话》是一部有严密理论体系的诗话著作的论断就不能成立,所谓《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发展的总结及高峰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样以来,诗话发展史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现在一般认为,严羽《沧浪诗话》自产生以后对后来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在宋元时代,严羽的影响并不很大。当时尽管有上官伟长、吴梦易、朱叔大等人继承其诗学,但影响只局限于邵武一带。魏庆之《诗人玉屑》收录严羽著作,但这并不表明严羽在宋末诗坛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因为魏庆之是福建人,而其《诗人玉屑》对闽人的著作收录独多,方回在《桐江集》卷七《诗人玉屑考》中批评说“闽人有非大家数者,亦特书之,似有乡曲之见”。《诗人玉屑》收录严羽诗学著作,在相当的程度上也与这种地缘关系有关。尽管《对床夜语》也引述了其诗论,但这也并不能证明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在宋末就已经散佚得很严重了,《宋史》中也没有为他立传。在元代,虽有邵武诗人陈士元、黄清老诸人继承严羽的倾向,搜集严羽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严羽的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整个诗坛。从现存的元代的诗学文献看,除了福建诗人以外,元代诗人引论严羽诗学的人极少。只是到了明初,闽中十子继承严羽诗学,尤其是高 的《唐诗品汇》,宗严羽之说,论唐诗分初、盛、中、晚,并大量引述严羽诗论,而此书为有明一代馆阁所宗,严羽的诗学才走出福建而影响整个诗坛。

本文蒙业师张少康教授审阅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日本九州大学 合山究教授、台湾政治大学黄景进教授曾在资料方面给予帮助,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 [1] 郭绍虞. 宋诗话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郭绍虞.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上编[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 黄景进. 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6.
- [4]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四库全书本.
- [5] 张以宁. 翠屏集[M]. 四库全书本.
- [6] 李清馥. 闽中理学渊源考[M]. 四库全书本.
- [7] 黄镇成. 秋声集[M]. 传钞洪武十一年刊本,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 [8] 张健. 从怀悦編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与篡改[A]. 中国诗学: 第五辑[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龚 言)

Canglang Poetry Talks Was Not Compiled by Yan Yu

ZH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fter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Canglang Yinjuan and *Canglang Poetry Talk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Yan Yu had not written the poetry talks entitled *Canglang Poetry Talks*, the five parts of *Canglang Poetry Talks* being originally irrelevant essays written by Yan Yu, and not compiled by him. Huang Qinglao of the Yuan Dynasty collected and compiled the five essays, and Hu Qiong of the Ming Dynasty entitled the five essays *Canglang Poetry Talks* and published it. Because the five essays were not originally a book of poetry talks, the position of Yan Yu in the Poetry Talks history should be reconsidered.

Key Words: Compiler; *Canglang Poetry Talks*; Yan Yu; Huang Qinglao; Hu Qiong